

人文大師下午茶·朱鴻林教授談 「鳶飛魚躍：我學中國近世歷史的感想」[#]

- 時 間：108年5月27日(一)14:00-16:30
地 點：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中央展廳
主 講 人：朱鴻林(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中國文化學系講座教授)
主 持 人：呂妙芬(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暨研究員)
與 談 人：史甄陶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
何威萱(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)
何淑宜(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)
吳孟謙(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
李忠達(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
侯潔之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)
張藝曦(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)
張繼瑩(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)
楊正顯(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助理研究員)
魏綵瑩(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)
記 錄：何幸真(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)



圖一：人文大師下午茶·朱鴻林教授談「鳶飛魚躍：我學中國近世歷史的感想」

[#] 本文由何幸真博士記錄整理，經主持人呂妙芬教授審訂。

此次「人文大師下午茶」的主講人為香港理工大學朱鴻林教授。朱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近世歷史與文化研究，對明代思想文化與政治、社會的關係著力尤深，不僅本身研究成果斐然，也提攜、培育了許多優秀的學術後進。對於甫從事教研工作，或正以此為目標的年輕學人而言，朱教授的經驗與心得無疑能提供極佳的示範與啟發。當日活動分兩部分：首先由朱教授進行演講，分享自己從事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心得；接著由與談人進行提問，就研究或教學方面遭遇的問題，請教朱教授的看法或經驗。

一、「鳶飛魚躍」解題

朱鴻林教授以「鳶飛魚躍」來形容自己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過程與心境，此語出自《詩經·大雅·旱麓》的詩句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」，用以比喻萬物任其天性而動、各得其所，而朱教授本身的研究歷程，即是這樣一種自由而活潑的動態過程。朱教授表示，就像鳶、魚各有其活動範圍般，他一直以來也都悠遊於自己的領域、專注於自己的工作。獨立不群、和而不同是他的一貫態度，讓他得以在學術的道路上始終保持自我，自由自在地做自己。

二、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和素材

朱教授指出，思想文化史（intellectual history）與理念史（history of ideas）不同，後者主要致力於釐清理念本身的結構、體系、意蘊、價值，但前者的研究對象除了上述層面，亦包括思想理念的前身、來世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，或是其起源、過程和導致的後果，乃至於促使這些思想、理念產生的個人與集體因素。而研究思想文化史最基本的素材，就是傳記、文書這類記述相關個人、群體言行的文本。

不過傳記、文書等文字材料，並不盡然能夠反映思想、理念涉及的個人與集體因素。朱教授提醒研究者，使用此類材料時，必須留意其「文字主觀性」的問題。將個人或群體生平、言行、思想「形諸文字」，這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意識、蘊含動機的行為。例如傳記文本的撰寫、取材與編輯，無論是自我書寫還是他人追述，皆可能因為特定考量而有所偏重、規避或剪裁；書信則往往涉及交際應酬之類的社會需求；個人著述就更不用說了，此類文獻原本就是作者有意識、有計畫地編撰，具有特定中心思想的產物。而版本問題又是另一個使用

文字材料時不可忽視的層面。採用的是稿本或刊本？是否確為真跡？這些問題都可能影響研究的結果。

此外，近年歷史學界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投入田野考察，發掘未能進入主流論述或知識圈內的在地材料，此一現象亦可見於思想文化史的領域。朱教授將田野考察中找到的物質材料歸類為與文字材料相對的「客觀實物」，但亦指出這類素材形成的邏輯或動機仍舊充滿主觀性。



圖二：朱鴻林教授解題「鳶飛魚躍」蘊含

面對各種材料涉及的主觀性問題，如何盡可能做出客觀的判斷？對此朱教授認為，應師法清代學者的態度，既要考據，也要考證。他在研究上非常強調版本的重要性，認為追求「文字有據」仍僅止於「考據」的範疇，但所根據的文字未必是正確的，故還必須更進一步，確認該文本或版本是否出自作者手筆，而這就是「考證」的工夫了。朱教授表示，考證的步驟和結果是非常重要的，以此奠基的研究，才可能是正確、合理的。

三、認知和論斷的思維模式

演講當中，朱教授亦以自身研究明太祖（1328-1398，1368-1398 在位）的經驗，分享其認知和論斷史事的思維模式。他認為就思想文化史研究而言，「實地的移情」是很重要的，也就是採取「易地而處」的思考方式，站在當事人的立場，設想自己若處在相同情境下，會產生什麼樣的行動、想法或感受。自己能

否解決同樣的問題？是否做出同樣的事情？又是否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？這樣的思考方式，讓朱教授越發地體認到，不同人物互異的價值觀，將影響他們對事物的看法與判斷，從而做出不同的行動，帶來不同的後果。從事歷史研究其實也是如此，歷史學者的價值觀往往會影響其對史事的基本判斷，和對史料的操作與解釋。而就如同史家的價值判斷會受限於其所處時代，研究者也必須留意不同時代皆有其各自的情境，身處其中的人們對同一文本、思想的理解與態度亦將有所差異。這也正是歷史的複雜之處。

四、學習中國歷史的感想

演講最後，朱教授分享了自己學習中國歷史，特別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感想。在他看來，中國歷史之長、地方之廣、傳世人物之富，研究材料可隨意取擷，人情事理可隨處體認，這些豐厚的資源正是他得以「鳶飛魚躍」，於學術天地間優游自在的原因。學習中國歷史，也讓朱教授學會「尚友古人」，先哲們的人生經歷啟發了他對「運命」的理解，讓他能克服人生中的失意階段，並專心貢獻自己所長，致力於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。對執政者或政治決策者的研究，則使朱教授體認到「破後不見得能立」，以及處在特定地位與情境下的難處，而願意適度地給予居上位者肯定與理解。

學習過程中的所知所得，對朱教授為人處事和教學、研究的態度，亦有深遠的影響。他因此懂得欣賞他人的長處，時刻保持謙卑的態度，並以「學／教而後知不足」的想法自我惕勵。他也越發體認到文化傳承與教育事業的重要，強調為師者須自尊自重，栽培學生則不能要求過苛，而應培養學生的信心，引導學生自我計畫，使其在自由的同時亦能自動，並樂於所學。

與臺灣相同，現今香港的學術圈亦是一個講求速效、期望「立竿見影」的世界。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研究者，如何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自處？朱教授認為，唯有抱持「耐心、靜心、專心」的態度，才能夠在研究的道路上自立、自主並有所自得。

五、提問與回應摘要

此次「人文大師下午茶」邀請的與談人，其研究多是明清思想文化史領域的年輕學者，且大多任教於大專院校，而需同時兼顧教學與研究工作。也因此，

除了些許學者對朱教授的研究成果提問外，多數與談人所提出的問題，都是源自實際的研究過程與教學現場，或是涉及當前的研究趨勢。

提問：(1)《明儒學案》作為瞭解明代思想發展的重要材料，其局限性何在？又是否能從中找出拓展現有研究的新視角？(2)明代「從祀孔廟」的標準似乎反映了一種「羽翼六經」重於「羽翼程朱」的傾向，請問為何會有此種現象？上述兩者在明代的關係又是如何？

朱教授指出，《明儒學案》的優點在於其所討論的時間與群體跨度無他著能出其右，但缺點在於沒有好的版本，而這也是他當初投入點校工作的原因。其次，該書所建構的只是黃宗羲（1610-1695）心目中的儒學，是一種「有體無用」、不重視事功、「外王」（經世）層面的儒學；然而實際上，不僅朱熹（1130-1200）、王陽明（守仁，1472-1529）這些自成體系、備受推崇的大家都是「兼顧體用」的學者，明初的宋濂（1310-1381）、劉基（1311-1375），明代中期的丘濬（1421-1495）等人也都擁有具體的事功。況且所謂「經世」所經之「世」，還會隨著時空情境有所變化，這也是一個重要，但《明儒學案》卻無法關照到的問題。

關於「羽翼六經」和「羽翼程朱」的問題，朱教授認為，這兩者在明代其實是一樣的，因為當時就是以程、朱的角度研究六經。不過明代確實是一個程朱思想備受挑戰的危機時代，朱子學在當時亦是表盛裡衰，少有人真正理解其內涵。至於從祀問題，朱教授指出，有無著作在明代是重要的入選標準，但到了清代其標準又有所轉變。



圖三：現場提問與回應

提問：在朱教授研究過的明代人物中，最為「尚友」的是哪一位？

朱教授表示，他在年輕時期欣賞陳白沙（獻章，1428-1500），後來隨著人生經歷的增加，逐漸將丘濬視為自己尚友的對象。因為丘濬正是透過著述來完成自己的志願，而他的著作也對朱教授影響深遠。朱教授認為，丘、陳二人其實都是「做好自己」的類型，過往他在失意之時，也曾由此二人的境遇中尋得慰藉與啟發。此外，朱子也是朱教授心嚮往之的人物，但作為師法對象實在難以仿效。

提問：(1) 從事個案和通盤性的研究，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？(2) 促使朱教授進行田野研究的契機是什麼？田野考察對於思想史研究有何幫助與局限，又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？

個案與通盤的研究，在朱教授看來其實並不衝突。若以「樹」和「林」作為比喻，從事研究固然不需考察林中所有的樹，但至少應該掌握每種樹木的種類，並對森林所在的氣候、土壤有所瞭解。朱教授認為，研究必須奠基於一個大的問題，個案累積夠多便能予以驗證，而且只要研究做深了，便會發現各個議題之間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的。

儒學如何落實於社會，一直是朱教授關心的課題。而在江西、福建、廣東等尚未完全開發的地區，其實仍有不少傳統思想的遺存，能為上述問題的探討提供材料，田野考察也因此有了價值和必要性。當然，自田野取得的材料，和一般文字史料同樣需要鑑別和考證。朱教授除了提醒研究者，蒐集和利用口述



圖四：朱鴻林教授（前排右三）、呂妙芬教授（前排左三）與年輕學人合影

材料時必須謹慎，還強調使用碑刻材料時，要掌握的其實不只文字，也應留意碑本身的狀態，例如方位、面向、材質、風化程度、副文本等資訊。

提問：(1) 執教於大專院校的研究者，應如何在教學和研究之間取得平衡？(2) 朱教授本身如何看待價值信仰和學術之間的關係？

針對第一個問題，朱教授提供的建議是：先致力於教學，等熟練之後就有時間做好研究。至於第二個問題，朱教授本身就是從自身研究的人物及思想中，獲取為人處世上的激勵與啟發，故他認為，價值信仰確實是很重要的，只要相信自己從事的研究是有用的，當自己有所得時，他人也會因而受益。

提問：(1) 對數位人文有何看法？(2) 若要訓練學生達到「自由而自動」的境界，具體應如何進行？

數位工具是否適用於人文學科的研究？朱教授認為，更重要的關鍵其實在於提出的問題。不過朱教授也指出，從事研究固然需要與時俱進，但就材料的分析而言，「質」比「量」更重要，很多層面的問題也並非大數據所能解決。

關於訓練學生的方式，朱教授採取的是「先開猛火，再文火慢燉」的策略：起初先透過每週研讀報告的形式，密集訓練學生閱讀文獻及二手研究，同時藉此協助學生找到自己的研究興趣。一旦學生養成習慣，便能自動自發、按部就班地投入研究。

提問：如何選定個案研究的對象？

朱教授建議根據自己探討議題的核心問題來挑選個案。能據以回答所問的問題，是個案的基本條件，而最理想的個案則是能夠呈現動態的圖像。

提問：(1) 研究明代江南以外的地區（如江西）及在地的的重要人士，可能遭遇學界因不熟悉該區域而無法理解其重要性、難以對話的問題，應如何解決？(2) 在一個大的問題意識下進行地方研究，可能面臨兩種問題：一是研究是否終將淪為該命題另一例證的疑慮，二是結論無法用以解釋其他地區的質疑。如何克服這樣的問題？

朱教授認為，即使同樣的問題意識下研究不同的地區，仍舊會有其參考價值，因為這將會是相對於「主流區域」的異例。朱教授也建議，倘若擔心學界較不熟悉江西的案例，難以進行對話，可在討論時找江南的案例作為對照組，並勉勵與會學者能夠發掘學界尚缺乏認識的重要人物，便是一大功德。

提問：身兼明清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，如何讓通識課程的學生更容易吸收、理解自己鑽研領域之所得？

由於通識課程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學科，朱教授認為，通識教學其實和老師本身的研究專業並沒有太大關聯，因為這類課程最主要的是談一些學科之間共同關心的課題。以教、學雙方共同關心的議題為內容，既能讓學生更易理解、接受，老師本身也可以藉此發展新的教學方法。

提問：明代經筵教育對皇帝有無實際影響？

就朱教授看來，若欲檢視經筵對皇帝的影響，比較明顯的指標應是科舉內容、官箴和聖旨。整體而言，明代經筵對皇帝的影響並不大。因為經筵講官多只是照本宣科，內容也會經過大學士和宦官的審閱，講官本身無法堅持己見。不過即使知道效果不好，經筵在明代仍一直被視為必須進行的工作。